

革命文物选萃

击毙侵华日军中将的铁证



阿部规秀的军大衣，二级文物。衣长110厘米，肩宽46厘米，袖长58厘米，重约2.3千克，无肩章，袖口轻微磨损。2007年6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戴镜元将其捐赠给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它看似普通，却承载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战记忆。

1939年1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主力1500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进行报复性“扫荡”。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在获得情报后将其诱至黄土岭设伏地域围歼。激战，我军锁定疑似日军指挥所，并进行炮火轰击，阿部规秀被击毙，这是八路军在抗战中击毙的侵华日军最高级别将领。他的死讯令日本朝野震动，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大行山上”。此役共歼日军900余人，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相继致电祝贺这一重大胜利。

打扫战场时，缴获了这件军大衣和一把指挥刀，并被送到延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把这件军大衣奖励给戴镜元，以表彰他在破译日军情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这件军大衣不仅是黄土岭战斗胜利的直接物证，见证了八路军的英勇善战与高超战术，更凸显了情报工作对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无数无名英雄为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如今，它静静陈列于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里，作为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激励着参观者传承抗战精神。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 江东文）

黄铁城穿过的蓝色囚服



黄铁城穿过的蓝色囚服，二级文物。这套珍贵的囚服由上衣及长裤组成，蓝色棉质，上衣为立领，单排扣五枚；长裤为直筒型，腰间缝有两根布条。该囚服由共产党员黄铁城捐赠。黄铁城（1912—2003），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大连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1941年6月，他在前往苏联传递情报途中，在中苏边境被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当局逮捕，判刑后关押于旅顺监狱。1945年，黄铁城被释放，离开旅顺监狱时就穿着这身囚服。5年后，黄铁城调任西安从事教育工作。1976年，他回到大连参观旅顺监狱旧址展览馆时，将这套珍藏多年的囚服捐赠该馆。

旅顺监狱由俄国于1902年始建，日本在1907年扩建，共有275间牢房、15座工场、1座绞刑场。监狱四周筑有红砖围墙，墙内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同年8月24日，监狱解体。1971年7月，监狱旧址经过全面修复，正式对外开放。1988年，监狱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正式更名为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这套囚服是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馆藏的唯一一件被关押者穿过的囚服，是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不屈抗争的重要物证。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 李迪）

快速变化社会与革命文物保护创新实践

文晨峰

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以“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为主题，呼吁博物馆要积极应对挑战和机遇，与时代共振，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可持续发展领航。革命文物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不仅是博物馆赓续精神血脉、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载体，更是参与国际文明对话、讲述中国故事的核心资源。在此背景下，积极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类文明互鉴的系统性工程。

革命文物保护的创新实践

从被动抢救到主动预防保护的观念革新。传统的革命文物保护多以抢救性修复为主，虽然能暂时挽救文物安全，但往往是治标不治本，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投入成本高昂。随着对革命文物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预防性保护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同时国家也出台相关政策，如《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便提出要统筹推进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保护，有效推动革命文物保护的理念革新。此外，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也为革命文物预防保护实践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湖南、陕西等省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在文物保存环境中部署温湿度、光照、有害气体传感器等设备，实现了环境控制、监测、评估和精准调控等。这种主动防御措施确保了文物能处于稳定保存环境，显著降低文物病害的发生。

智慧化与数字化技术为革命文物保护提供新路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要求在推进革命文物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指引下，将大数据、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逐步应用到革命文物保护中，推进革命文物保护信息化形态逐渐形成。利用三维激光扫描、高分辨率成像等技术对革命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建立三维数字化档案，可实现文物形态的永久保存，在此基础上开展虚拟仿真修复还能减少修复风险，提高修复效率和准确性。利用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材料的使用，有助于解决纸质加固、生物虫害防治等难题。

革命文物保护创新实践中的潜在挑战

区域技术应用失衡制约均衡发展。尽管技术创新成果显著，但受人才、资金、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革命文物保护存在技术应用失衡问题。发达地区凭借资金与人才优势，已构建起涵盖智能监测、数字孪生的全链条保护体系，能够全面深入开展保护工作；而部

分县级革命类博物馆因年维护经费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连基础环境调控设备都难以保障，数字化保护技术覆盖率更是明显落后。这种技术应用差距和不平衡严重制约革命文物完整性保护和历史价值传承。

技术伦理与数据安全风险凸显。随着数字化技术等革命文物保护领域的广泛应用，其安全风险也日益突出。一方面，智能算法对革命文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理解不足，在病害识别、修复方案制定等过程中存在算法偏见或者误判风险，可能导致历史价值误读、文物修复失真等问题，进而影响文物修复安全；另一方面，革命文物数字档案蕴含丰富的资源数据，价值极高，一旦面临黑客攻击、数据泄露等安全威胁，将给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民参与与模式下专业化和可持续性有待提升。全社会参与的革命文物保护模式虽然在广泛动员、扩大参与面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专业性和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由于公众普遍缺乏专业文物保护知识和技能，可能在认养、维护、监督等环节中对革命文物造成无意识的损坏，致使文物难以发挥实质作用。部分文旅融合项目在商业开发过程中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导致革命文物周边环境风貌遭到破坏，严重影响文物安全及教育功能和价值作用的发挥，这些潜在挑战都背离革命文物保护的初衷。

应对挑战的思考与建议

一是注重文物本体安全及价值传承。革命文物作为党领导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见证，具有不可再生性。保护革命文物始终将文物的本体安全与价值保护置于首位，无论是利用新型材料、数字化手段开展预防保护、修复，还是融合旅游发展、引导社会参与保护，都要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等原则，不损害文物价值，防止因技术使用不当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同时，要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精神

图片报道



观点摘编

Labubu“撞脸”文物启示文创新思路

易艳刚在2025年6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撰文认为：当下，各地都在费尽心思讲述地方文化故事、文旅故事，其实，与其仓促炮制粗陋“雷人”之物，不如沉心静气，细细品鉴时光长河中的文物珍宝，从中探寻古今交融的崭新路径。尤其随着3D打印、AR技术等日渐普及以及各类新材料不断涌现，文创设计与智造也有了更多可能性。一些地方政府不妨与本地博物馆、艺术馆等“联名”，共谱文化传承新章。我们乐见地方潮玩企业推出的创意产品，与传统文化“撞脸”甚至“撞个满怀”。这种跨越时空、脑洞大开的碰撞，正是当前很多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当意外“撞脸”变成有意识地“联袂”，当文化意味浓厚的跨界“联名”蔚然成风，当历史审美悄然融入现代叙事，或可催生更多Labubu那样的爆款IP，将中国文化故事讲得更生动。

AI时代更需田野调查的人文意蕴

陈思宇、田明孝在2025年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认为：田野调查似乎没有高深莫测的技术与法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看似容易入门，网络虚拟田野等也没有值得“炫技”之处，而这正是田野调查的朴实可贵之处：只要全心投入，就一定满载而归！唯有“深描”才是人类学

孜孜以求的事业（格尔茨语）。这里的“深描”可能就是田野调查不可替代的“关键技术”所在：我们必须身体力行“沉下去”，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描述当地人的所思所想，追寻其中隐含的各类符号意义。费孝通先生晚年用“将心比心”来概括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要旨与真意，社会学家周飞舟也强调田野调查以“贴近”而“平等”的实践给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心态感通创造了条件。对于研究者来说，田野调查在技术上的无可置换正在于把自己“沉下去”的“感同身受”，只有获得第一手的粗粝而真实的实践经验，才能达成对社会事实的深度挖掘，产生数字分析难以带来的经验想象力。

加强对纪念性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杨清望、陶华强在《东南文化》2025年第2期撰文《纪念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认为：纪念性文化遗产是能够为相关主体提供“纪念”价值的特殊类型文化遗产，加强对其法律保护是完善我国文化遗产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纪念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不仅是维系、修复和强化共同体记忆以及传承人类文明的客观需要，更是建构文化身份、促进文化身份认同及保证文化认同再生产的必然指向。然而，既有法律规定无法为纪念性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充分依据。因此，应将保护和利用

并重、系统保护和统一监管、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一体保护、公众参与作为纪念性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明确“纪念”价值的立法表达、保护主体的权力责任利益、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协同保护等制度体系的规范导向，构建调查记录和信息公开、分类登记和监测预警、权益补偿和激励保障以及损害评估和责任追究等制度，推动纪念性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

是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

张弛在《文物》2025年第4期撰文《是谁规划营建了凌家滩》认为：安徽含山凌家滩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第一批复杂社会中目前能够确认的最大规模聚落。这个聚落有内、外两重环壕，外环壕围合面积140万平方米，持续使用600年以上。规划和组织营建这种大体量的建设工程，显然需要有成熟的景观设计知识和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作为支撑。凌家滩聚落内环壕北门外岗地上东为“祭坛”墓地，西为祭祀区。墓地可分为西北、北、南三区，不同墓区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器物相差悬殊，其中南墓区最南边的两排墓葬年代最早，居中的4座大型墓葬，随葬了整个墓地中数量最多的器物，下葬年代最接近“祭坛”墓地和内环壕聚落的兴建时间，墓主显然拥有社群中最高的威望，应当就是凌家滩聚落的规划和组织营建者。